日本对近代东北水田农业的渗透与地方政府的对策

金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近代东北水田农业开发时期正是日本吞并朝鲜，不断加深对东北的侵略势力与实行殖民统治的时期。日本依仗其国家强势，在农业领域中重点投资经营水田农业，构筑在东北日本人粮食的生产与供应基地，并欲利用散居在东北各地主要从事水田农业生产的朝鲜移民扩大其侵略权益，以致水田农业部门成为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我国史学界尚未有从东北水田农业这一微观角度深入细致地论述日本侵略势力的渗透及东北地方政府的抵制对策之研究成果，与近代东北地区有很深关连的韩国、日本史学界则普遍存在贬低东北地方政府在促进东北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倾向。本论文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具体而深刻地揭示近代东北全体官民全面一致抗日的真实画卷，揭穿日本推行其“满蒙政策”的险恶用心和侵略本性。

【关键词】日本侵华 近代东北 水田 对策

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是1875年进入鸭绿江上游通化上甸子的朝鲜移民试种水稻成功而拉开序幕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不断扩大在东北南部地区的特权。日本外务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等机构积极推进以水田农业为重点的大规模调查及农业投资经营活动。日本人在东北地区最早经营水田农场是1909-1910年滨田某在安奉线石桥子站满铁附属地租借土地经营的5400坪水田农场，^①1911年、1912年日本国策机关“满铁”在熊岳城和长春附属地试种水稻，同时在安奉铁路沿线、奉天及其它地方进行了水稻的委托试验^②，确定了在该地种水稻的可行性。此后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日本人经营水田热。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以水田农业为主业和兼营的日本人共有743人，绝大部分集中在关东州和满铁沿线，水田面积增长迅速。

1915年5月日本通过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关

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以下简称“满蒙条约”），获得了在南满洲的土地商租权、自由居住往来，从事各种工商业及其它业务，在东部内蒙古与中国人合办农业及其附属的工业经营等特权，其侵略势力在“满蒙”地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在日本政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东洋拓殖会社（简称“东拓”）等国策会社的直接、间接鼓励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陆续进入东北境内的很多日本人会社、个人，以各种不法方式，获取土地的实际所有权，且能够得到日本领事馆的认证。这些日本人农场还倚仗特权干涉我国水利事业，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1921年5月日本领事馆甚至派员到水利局直接监视放水，日本人榊原农场在奉天水利局河道堵有横坝一道，萩原农场执事人竹崎末雄在水利局河道设木板水闸一处，严重影响下游耕种水稻……

满铁对经营水田的日本农户给予了积极扶助。具体援助包括建设农事试验场，试验普及符合日

本人口味的稻种，以提高大米的产量和商品性，开凿水井，租给日本稻户灌溉，并提供贷款保证等等。满铁曾对由正金银行向会社所推荐的稻户给予相当于其贷款额一半额度的保证，支持日本农场主在“满铁”附属地外购买水田。“满铁”最早的水田放款是1913年4月给住在奉天的胜弘贞次郎放水田耕地典契资本5万日元，帮助他取得土地10808亩。从1917年开始进驻东北的日本国策会社“东拓”则以获取收益高的水田为目的，重点贷款给朝鲜移民资金，当其无法偿还债务时，就押收其土地。

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至1930年仅有23万名，且其90.6%以上聚集在由他们控制的关东州租借地、满铁附属地，以致日本以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名目在东北扩张侵略势力受到很大限制。但与此相反，朝鲜移民足印遍布东北各地。1913年5月26日外务大臣牧野伸显对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命令中指出在东北的水田经营是有利的事业，虽然冒些险，但应不动声色地支援有信用的日本人经营水田，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以外地区，则应“保护”、“补助”朝鲜稻农，足见日本试图利用朝鲜移民渗透其侵略势力的意图。实际上朝鲜移民移居到某个地方，一形成村落，日本就会处心积虑地宣称朝鲜移民是日本帝国的“臣民”，领事馆和警察署便遣警派兵加以“保护”，并在各地增设领事分馆，设置“出張所”、“派出所”。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后，曾推进朝鲜移民加入中国国籍的步伐，但日本制造双重国籍问题，声称朝鲜移民无论是否取得中国国籍都应是日本“臣民”。日本之目的就是要强化对朝鲜移民的控制，扩大侵略势力。朝鲜稻农与中国农民之间因引水发生利益冲突时，日本常以“保护”者身份出现“调停”，激化并扩大民族间摩擦，挑起侵华事端。1931年7月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是其典型之例。

1920年之后日本还通过相继委任的日本领事馆领事、总领事兼任“朝鲜总督府事务官”，并派遣总督府派遣员常驻东北日本领事馆等举措，积极推进对东北朝鲜移民的间接统治。1921年5月奉天赤冢总领事编写的题为《在满朝鲜人问题》报告书中指出：“发展东北地区的水田事业，一方

面是为了强化对朝鲜人的直接统治，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东北成为稻米产地，有事之时，可为日本做贡献。”在1927年的“田中奏则”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欲利用数十万朝鲜移民扩大其侵略满蒙的险恶意图。

二

日本在加紧推动其侵华政策中，大力扶持主导东北地方政府的奉系军阀，藉以兑现并扩展条约中的侵略特权。掌握东北地方政权实权的奉系军阀为在东北站住脚，称雄全国，是不能脱离已在东北确立绝对优势地位的日本的支持。为此东北地方政府一方面严厉制止反日运动，在挽回利权问题上，自然也不敢公开得罪日本，另一方面则在全国上下反日情绪高涨的背景下，积极敦促中央政府对日进行强力交涉的同时，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敷衍、拖延日本践约要求，采取不公开的密令方式，想方设法加以抵制。九一八事变前夕当日本嚣张的侵略扩张危及其生存时，则公开坚决加以抵制。

1917年4月奉天省政府在接到农商部针对日本人劝诱“旅满朝鲜人会”试图根据“满蒙条约”中的商租条例，收买水田计划的密令之后，第二年颁布了《提倡华民耕种水稻办法》，并附加密令，命令切实严密监视不动产登记，提倡华民耕种水稻，限制朝鲜移民种稻。在东北三省地方政府陆续制定大力提倡并劝奖国人种植水稻，提倡商绅兴办稻田公司，并设立水利管理机构，制定水利章程等政策措施下，各地出现汉满人仿种水稻的现象。20年代中期复州河、大沙河及庄河沿岸的松树地方与金州三十里堡，形成了只有国人耕种水稻的地区。此外，地方政府还曾招募擅长耕种水稻的我国南方人来东北承种。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开发过程一直贯穿着实业救国的意图。

1915年“满蒙条约”签订之后，获取商租权成为日本掠夺东北土地的主要方式。东北地方政府及时传达并贯彻中央政府发布的《惩办国贼条例》，1916年下达的《商租地亩须知》、《租用地亩规则》等相关训令，并制定了《沈阳县公署商租征收处规则》^①、《土地商租暂行规定》等地方性的商租规则，强化了商租权只是土地的收益使用权，

土地所有权仍归地主所有，商租必须得到官府许可，不许地主与承租人之间发生以所租地亩为保证的借贷关系等各项具体限制措施，给日本人商租土地设置了种种限制和阻隔。

东北地方政府颁布的直接抵制日本商租权的行政命令，多见于1923年3月我国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正式通告日本政府全面废止“二十一条”之后。根据中央政府严格限制及最终废除商租权政策基调，东北地方政府也相应采取了严厉限制外国人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政策。但仍然不愿破坏与日本之间微妙关系的东北地方政府发出的大都是秘密训令，进行抵制时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1923年7月奉天省长向所属各县知事下达的《商租禁止命令》中，指出“满蒙条约”中所指的“南满”的区域范围仅限于30个县，而对南满以外的新民、台安等25县知事则下达了这些县在南满区域之外，一律拒绝日鲜人的土地和房屋租赁请求的秘密令。政府对违背商租手续与土地租借规定行径予以严厉处罚。1923年11月安东县知事关定保针对浪头村居民王治文等私租地亩房屋并私招韩侨佃种水田等事，予以高达大洋4885圆的罚金处置。^⑫对琿春天德惠乡居民郎寿成在1917年秋将地暗押于未入籍朝鲜移民李文胜之事，则严令其取赎，逾限不购即一律代为拍卖，以清纠葛。^⑬1923年奉天省长公署向辽沈道各县下令，要求仅限于从事水田的朝鲜移民，可签订一年为限的短期租佃合同，且须获得官府许可。奉天省政府把该项工作的执行，作为评定地方官业绩的一项内容。^⑭

当时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只有在延边地区才能依据1909年9月中日缔结的《中日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入籍就可拥有居住权与土地所有权。当地非入籍朝鲜移民也曾借助“佃民制”，享受过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但自1915年“满蒙条约”签订之后，官府开始禁止这种获取土地的方式，1926年5月延吉道尹发布《关于归化与土地所有权的規定》之后，这一现象则完全被加以严禁。吉林省政府在1929年1月下达了《归化鲜人土地买卖取缔》训令，还加强了对已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入籍朝鲜人土地买卖现象的监督。^⑮1931年5月吉林省政府颁布《管理延边中韩人民盗卖国土及盗卖耕牛单行章程》，规定在其不动产证明书上印

制“抵当给外国人时无效”的字样，外国人即便持有土地所有权证件，政府也不予以承认，并规定朝鲜垦民如不服从中国法令，则施以严厉惩罚，或取消其中国国籍。^⑯

1920年代下半期为抵制伴随各地水田的扩大而日益增多的朝鲜移民和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东北地方政府开始采取了较为强硬的限制、取缔措施。奉天省政府通过要求朝鲜移民提交日本出籍证的规定，设置朝鲜移民入中国国籍的障碍，以减少居住境内的数量，防止主权受损。1925年6月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三矢宫松与奉天省警务处长宇珍，在奉天秘密缔结了《关于取缔不逞朝鲜人的协定》之后，奉天省政府相继公布了《取缔韩人办法》及其施行细则、《修正管理雇佣韩侨垦种稻田办法》，严厉禁止朝鲜移民获得土地所有权，甚至不承认其租佃权，只允许一年为限的雇佣，且雇佣仅以耕种稻田为限。^⑰1928年之后奉天省政府颁布《奉天省管理韩侨章程总则》，加强对朝鲜移民的管理。该章程规定每年4月、10月调查两次朝鲜人户口，各地警察保甲驻在所或分所随时检查过往朝鲜人，或分发登记证，或监禁或驱逐不轨者和流浪汉。^⑱1929年2月根据南京政府的指令，下达了《韩侨租地回收令计划》，为奉天省37个拥有水田的县，准备了奉票500万元，以供收回朝鲜人租地。^⑲吉林省政府则采取了朝鲜移民只要获得入籍证，就赋予与中国人同等的待遇。为防止日本利用朝鲜移民收买土地的流弊，对入籍朝鲜人的土地所有权另订章程加以限制。地广人稀的黑龙江省则欢迎新的劳动力的移入。

20年代后半期随着能够在寒地栽培的“北海”（札幌赤毛）稻种试种成功，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大批转迁至日本势力相对较弱，官府限制松弛一些，且待垦荒地多的北部地区。水田面积随之向东北北部地区迅速扩展，南部辽宁省地区则出现萎缩现象。1928年沈阳县、新民县的水田面积合计53,131.6亩，较1923年的127,067亩减少了58%。^⑳1926年奉天省水田面积19,399公顷，仅是1924年的42.4%，减少了一半以上，而与此相反，吉林省则达到23,287公顷，较1924年增加了32.4%。黑龙江省1924年水田面积还不足1公顷，但1926年所属2个县的水田面积就达到了

358公顷，^②20年代末则达到了7,000多垧。^②

三

我国中央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严重警戒日本人经营水田农场，并试图利用从事种稻的朝鲜移民扩张侵略的行径，下达了很多限制并阻隔外人种稻的政策措施。但因种植水稻较其它旱田作物收益大，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经营稻田的地主或富农不断违规，1923年1月7日至9月的8个月安东县因此而受罚的人就达52名。^③甚至一些县政府，当看到种稻实属有裨农业，而驱逐朝鲜移民之后，当地的水田很快就荒废的现实，以振兴地方经济，增税裕收为由，有时予以默认并承认其既成事实。^④在1931年7月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来看，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竟敢在未取得长春县政府许可，就把该地12名地主约500垧土地，以10年之限，长期租与朝鲜移民李升薰等9人，并在吉林省的中心地带长春县北一下子募集朝鲜稻农118名前来种稻，完全违背了1927年12月吉林省政府公布的《朝鲜人土地租借规定》、1929年7月颁布的《吉林省政府建设厅管理稻田水利暂行章程》等吉林省政府下达的严格限制和取缔朝鲜移民之训令。从中可见在实际生活中政府下达的抵制训令，各地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⑤不断下达的训令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限制措施收效甚微的实情。

东北地方政府在水田农业领域抵制日本侵略势力渗透，收回利权的对策，总体上取得了成效，终使日本长期要求解决的“土地商租权”等悬案，一直“悬”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促进了水稻生产的迅猛发展。东北水田自19世纪70-80年代从无到有，到1913年达到4000多公顷，1921年猛增到4万8000多公顷，8年间实现了约12倍的增长，1931年则上升为8万1800公顷，实现了20倍的增长，^⑥1930年的水田分布已大体上形成了1945年日本败降时的分布格局。^⑦我们应肯定东北地方政府在东北日益走向日本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中，推进农业近代化以及维护国家利权中所做出的抗日救亡图存的努力，但也应指出软弱的地方政府因其自身的政治利益所限，无法全力动员和提供社会所需的资源供给，以致抵制绩效大打折扣。

注释：

- ①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记录 1-7-7-12。
- ② 黄越川：《东三省水田誌》，上海美成印刷所，1930年，第4页。
- ③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殖产部农务科：《满洲邦人农业经营者一览》，1931年，第28页。
- ④⑦⑧⑨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奉天省长公署 JC10-2227号、JC10-2668号、JC10-2668号、JC10-7563号、JC10-7563号、JC10-7563号。
- ⑩ 转引自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第308-309页。
- ⑪ 朝鲜总督府：《关于在外朝鲜人》，《朝鲜统治史料》第10卷，第244页。
- ⑫ 在外朝鲜人事情临时增大号：《南满及间珲朝鲜人事情—附水田事业的现状》1923年，第115页。
- ⑬ 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南满洲土地商租问题》，1926年版，第31页。
- ⑭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吉林省政府，C24J101-06-1273号。
- ⑮ 辽宁省档案馆：《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9，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第564页。
- ⑯⑰⑱ 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在满鲜人与支那官宪》，朝鲜总督府行政学会印刷所，1930年，第286页、178-179页、242-243页。
- ⑲ 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东北官宪所发排日法令辑》，1931年，第52-53页。
- ⑳ 杨昭全、李铁环：《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042页。
- ㉑ 沈阳县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沈阳朝鲜族志》，1989年，第56页。
- ㉒ 金正柱：《朝鲜统治史料》，8卷，1971年，第898-899页。
- ㉓ 《东北新建设》第1卷，第3期。
- ㉔ 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稻的栽培与朝鲜移民》，国资料院出版社，2004年，第144-151页。
- ㉕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刊行，1947年，第93-94页。
- ㉖ 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53页。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L06BZS003）；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批准号：20051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吴占军）